

国际分校的科研生产力

杰森·雷恩、汉斯·珀尔

杰森·雷恩 (Jason E. Lane):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教育学院院长、教育政策和领导力教授

电子邮箱: Jason.lane@suny.edu

汉斯·珀尔 (Hans Pohl): 瑞典研究与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 项目主任

电子邮箱:hans.pohl@stint.se

国际分校(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通常被视为主要的教学机构,并被批评为仅仅是对其本土校园(home campuses)的肤浅复制。诚然,国际分校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教学,其质量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原因是作为初创组织,它们必须开发和提供学术课程,同时招募教职员和学生,以开发收入来源。与私立高等教育类似,绝大多数学校可能会继续把重点放在教学上。

尽管如此,现在国际分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了 20 多年,我们的数据表明,三分之一的此类机构已经开始从事一些研究,其中一部分机构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研究文化。尽管在教育质量和研究生产力方面,国际分校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根据 Scopus 的学术出版物的测量,我们发现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分校从事研究的趋势。

为了进行这一分析,我们检索了 1996~2016 年期间由跨国教育研究团队确定的 250 所国际分校的出版记录。其中 149 所分校在此期间至少发表了一份出版物;大约三分之一(N=93)在同一时间内发表了 10 篇或更多的文章。

虽然我们记录的一些国际分校已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但直到 90 年代中后期,国际分校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在 1996 年,也就是我们研究的第一年,没有基于国际分

校的学术出版物的记录。2000 年有 82 个国际分校(其中许多是近期建立的),数据显示当年国际分校的全球研究生产力不足 50 份出版物。到 2009 年,每年的国际分校研究论文超过 500 篇,2016 年迅速增长到超过 3500 篇。在那一年,国际分校的出版物总数达到近 2 万份。

全球趋势

国际分校分布在 82 个国家。一些国家可能只有一个国际分校,而其他国家可能有几十个。至少有四个国家的 10 所国际分校出版了 10 份或更多的出版物:中国(14 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3 份)、马来西亚(10 份)和卡塔尔(10 份)。然而,这些数字掩盖了重要的国家差异。虽然马来西亚和卡塔尔在这一组中所占比例最低,但它们几乎代表了这些国家所有的国际分校。以卡塔尔为例,从 2006~2016 年,国际分校贡献了该国年度出版总量的 25%到 40%。中国的情况看起来非常不同,其拥有数量最多的国际分校,并出版了数量最多的内容基于国际分校的出版物。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中国的国际分校出版了 5000 份出版物。然而,这些出版物大约只占中国全部研究生产力的 1%。

当我们研究出版物的引用影响时,国际

分校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上述四个国家的领域加权引文影响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均有所波动,但在过去十年中总体呈上升趋势。当我们根据国际分校出版物和本地出版物对领域加权引文影响进行分解时,我们发现基于国际分校出版物的引用影响超过了本地机构,通常是在相当大的水平上,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因为出版物质量的作用还是来自本国学术资本溢出的结果,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机构的生产力

每个国际分校的发表计数差异很大。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三分之二的国际分校在其整个存在过程中发表的文章少于 10 篇。另一方面,前五名的国际分校的累积发表量均超过 1000 篇,前三名的累积发表量均超过 2500 篇。这五所大学,发表量从高到低分别是: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校区 (the 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卡塔尔的德州农工大学 (the Texas A&M Qatar)、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校区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中国的西交利物浦大学,以及卡塔尔的威尔康奈尔医学院 (the 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 in Qatar)。这些数字可能还会继续增长,因为前 10 名的国际分校每年的出版数量都超过了 100 份——其中前 3 名的出版数量截止到 2016 年每年都超过了 400 份。

国际化研究

我们的研究结果之一是,国际分校可以成为研究国际化的有用机制,对主办国和输出国机[由于这里这两个概念用的很多,包括前面的文章,但是求统一的原则,我们就都给改成和前面文章一样的名词哦。]构都是如此。

当进一步查看上面提到的四个国家时,

我们发现与国际作者合著的国际分校出版物超过了本国机构国际合著出版物的百分比。在卡塔尔,2016 年约 85% 的国际分校出版物有国际合作作者。卡塔尔本地机构的这一数字要低一些,不过也只是略有下降。然而,在中国,与国际作者合著的国际分校论文比例下降至 68%,但这一数字比中国高校高出近 40 个百分点。

当我们转而研究前五名最具科研成果国际分校的数据时,我们发现了类似的趋势。与国际合作者合著的国际分校出版物的百分比在每一项研究中都超过了国际分校的母校。位于卡塔尔的德州农工大学 (the Texas A&M) 有 90% 以上的出版物是基于国际合作的,而位于卡塔尔的德州农工大学只有 40% 的出版物是国际合著的。

当我们对协作进行网络分析时,有两个有趣的发现。首先,最常见的国际合作是在分校和母校之间,这表明国际分校对母校研究工作的国际化有直接影响。其次,国际分校使用的机构合作模式与本地校园模式之间几乎没有重叠。这表明,国际分校正在开展新的合作,通常包括更多附近地区的机构。

瞻望未来

数据表明,国际分校的人群可能正在分化发展,这与我们在私立高等教育中所看到的情况类似。尽管绝大多数院校仍专注于提供来自本土院校的替代教育体验,或吸收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有一部分院校似乎确实专注于推动一种更符合半精英院校的强大研究文化。

研究领域出现这种增长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在机构和主办国之间多少有些特殊。原因可能包括:学术文化的成熟程度,雇佣更多高质量的学者,以及更好的数据报告(例如,作者将国际分校作为自己的署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是什么导致了三

分之一的国际分校研究的增长，又是什么抑制了剩下的三分之二。此外，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国际分校的研究文化对课程、学生和整体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与那些不强调研究文化的分校比较来看。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一些国际分校既有能力又能积极从事学术出版物的创作。究竟这是个人创新能力还是机构的战略重点，尚不清楚。